

#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融合的三条路径

颜青山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哲学界通常以两个对立哲学运动来概括当代西方哲学,英美哲学属于分析哲学运动,而欧陆哲学则属于现象学运动。不过,这两个哲学运动早就开始了融合趋势,并出现了“分析现象学”的学术形态。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其融合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路径:第一个路径是现象学的分析化,包括英国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学派和美国从芬德莱到齐硕姆再到弗莱斯达尔的哲学活动;第二个路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代表性工作包括弗莱斯达尔早期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的活动及印裔哲学家莫汉蒂对弗雷格和胡塞尔的比较研究;第三个路径则是现象学立场在分析的心灵哲学中运用,早期代表是反人工智能的德雷弗斯和塞尔。

**关键词:**分析哲学;现象学;融合;三条路径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8)03-0008-07

如果以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或哲学运动来概括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我们通常会吧英美哲学归属于分析哲学运动,而将欧陆哲学归属于现象学运动。但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关系,达米特1990年代说过,对1903年的德国哲学学生来说,弗雷格和胡塞尔的形象如果“不管他们旨趣上的某种歧异,必定不是作为两位深刻对立的思想家,而是在定位上相当明显地接近”<sup>①</sup>。分析现象学者默汉蒂(J.N. Mohanty)也指出,在20世纪初的哲学家那里,“胡塞尔和弗雷格几乎属于同一哲学世界”<sup>②</sup>。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曾经有着广泛的早期互动,它们的分裂始于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其令人瞩目的事件是石里克对胡塞尔的批评和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笔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就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早期关系作出描述和分析<sup>③</sup>。不过,还在分裂时期,维也纳小组的外围成员、早年追通过胡塞尔的考夫曼就已经在《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一文中作出预测: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并非不相容,而是在各层次上互补的,“如果经验主义坚持追求其目标,即科学分析的方法,那么,这些造成现象学反思之出发点的困难必定也会涌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并迟早转向现象学<sup>④</sup>。虽然原因和理由

有所不同,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开始全面融合,并且出现了“分析现象学”这样一种哲学学术形态。

然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最初融合可能比“分析现象学”的起源要早得多,大致可以区分出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沿袭早期分析哲学受惠于现象学的思路。在英国以赖尔和奥斯汀为代表,主要关注的是日常语言的意向性分析;在美国则经历了以芬德莱、齐硕姆和弗莱斯达尔为代表的三个阶段。这条路线也可以看作是现象学的分析化路线。第二条路线是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以早期的弗莱斯达尔和默汉蒂为代表。他们所作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从现象学的概念出发作出容易使分析哲学家接受的理解和阐发。第三条路线是心灵哲学中现象学立场的运用,以德雷弗斯和塞尔为代表。他们以现象学的观念扭转了早期关于人工智能的心灵哲学的倾向,是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路线。这三条路线正在融合,也正因为这种融合才出现了“分析现象学”的学术形态。

## 一、现象学的分析化

摩尔和罗素对现象学的兴趣通过两个学术传统延伸着,从而成为现象学分析化路线的主导力

收稿日期:2018-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研究对实验哲学的超越”(15ZDB01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实践知性与行动动机”(15YJA720010)。

作者简介:颜青山,男,湖南衡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量,这两个传统分别是英国的牛津学派和美国分析哲学运用于现象学的思潮。

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旗手赖尔在其《心的概念》中探讨了身心关系的古老问题。就此,可以提出的一个困惑是,在20世纪初就已经转向语言分析的英国哲学,在逻辑实证主义清除形而上学的呼声甚嚣尘上时,赖尔何以又突然回到形而上学嫌疑最大的身心问题?

赖尔研究该问题的一个可能是,他恰恰通过语言分析消除了这个最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把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化归为一个犯了范畴错误的问题。然而,如果赖尔只是消除这个问题,那他就不必对此作出正面回答,而只要说该问题属于提问错误即可。问题是,赖尔不仅指出传统回答的谬误,而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与传统答案形成竞争关系。赖尔的积极回答无疑肯定了问题的合语法性,传统的错误只在于答案。

问题的最佳答案恐怕还要到现象学的潮流中去寻找,在分析哲学或逻辑实证主义之外,现象学一直关注着心灵和意识问题。事实上,赖尔曾经对胡塞尔的思想十分着迷,他的动词逻辑以及对心灵状态(如感觉、信念和意志)的逻辑分析受到过胡塞尔的深刻影响,其本人就自称《心的概念》就是现象学的<sup>⑤</sup>。赖尔认为笛卡儿心身二元论犯了混淆意向性与对象性的范畴错误。心灵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对象化或因果化的事件或实存,它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心理的;心灵不是身体中的“幽灵”,也不等于情绪、感觉、意志等可以外在描述的状态,乃是一种意向性的倾向和能力<sup>⑥</sup>。

1929年赖尔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撰写的长篇书评中称其对现象学的发展是灾难性的<sup>⑦</sup>,那么当他在1949年出版《心的概念》、宣称终于告别二元论对自己的长期误导时,是否意味着他已经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存在主义呢?至少,存在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除笛卡儿的二元论;而就其将心灵看作是“意向式”(Noesis)的倾向和能力,主张以智能(intelligence)取代智识(intellectual)、区分knowing-how和knowing-that而言,与存在主义对“上手”与“在手”的区分就十分相似<sup>⑧</sup>。当然,他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存在主义,而是称为“行为主义”,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莫名其妙而又长期受到误解的术语,人们常常将它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联系起来。如果说这两者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反对

内省心理学,反对二元论或机器幽灵说。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同一的。后者是外在描述的,是因果性的,而前者是意向性的。或许可以恰当地将前者称为第一人称或意向性的行为主义,而后者称为第三人称或因果性的行为主义。

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一直保留着现象学的旨趣,在赖尔之后,奥斯汀主要分析了所谓“言说行为”(speech-act),即将语言活动看作为一种行动性意向式,“说”犹如“打算(做)”“希望(做)”等行动性意向式。语言的核心功能是施事性表达(performative utterance),无关乎真假,而关系到执行,我们说一个句子不是说某物,而是执行一类行动<sup>⑨</sup>。奥斯汀明确宣称他的研究是“语言现象学”,而不是分析哲学名义下的“语言哲学”<sup>⑩</sup>。奥斯汀对“言说行为”的关注符合现象学的发展趋势,即从经典的静态意向性分析(如“看”“相信”“害怕”等)转向了动态意向性分析(如“说”“做”等)。

在斯特劳森区分语词的“使用”和“提及”时,曾经被追问是否受到过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观点的影响,但他否认了这一影响。其实,将他的区分类比于“上手”和“在手”的区分更为恰当。当一个语词在“使用”时,是处于“上手”状态,与语境一起构成肉身的意向式;而当该语词“提及”指称时,则它处于“在手”状态,我们在谈论对象或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这种区分更可看作赖尔关于knowing-how和knowing-that区分在语言哲学上的运用,语词被使用时的意义处于knowing-how状态,而提及时则处于knowing-that状态。

战后的美国,尽管盛行的是分析哲学对抗现象学的风潮,但在这个风潮之外也存在着早期分析哲学受惠于现象学传统的人。战前年代,发伯(Marvin Faber)开创了美国的现象学传统,后于1940年创立著名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杂志。有趣的是,后来同费格尔一道主编《分析哲学读本》(1949)而深刻影响战后一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的塞拉斯,却在20世纪30年代师从发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sup>⑪</sup>。

就分析哲学运用于现象学的美国传统而言,出现了三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芬德莱、齐硕姆和弗莱斯达尔,这三个人物又分别围绕着现象学的三个人物——梅农、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展开他们的分析性方案。多年后,昆恩对分析哲学运用于现象学的早期研究作出了一个大致统一的源流性评价:“胡塞尔

现象学的弗莱斯达尔诠释是现象学运动(广义上的)运用于当代分析哲学的第三思潮(the third major influence)”;而此前的第一个思潮是芬德莱《梅农的对象论》所开创的梅农逻辑系统的构建,这个传统主要是关于梅农的重要概念“非存在对象”(nonexistent object)的逻辑系统;第二个思潮则是齐硕姆于1952年开始所致力发展的认识论逻辑,这个系统来自于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准则的形式化<sup>②</sup>。

虽然芬德莱的主要学术生涯不在美国,而且他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在哲学史方面,但他早年对梅农的研究却在他退休后到美国时形成了影响力。出生于南非的芬德莱,大学毕业后游学于牛津,因接受罗素的影响而偏向实在论——不过,其实在论思想一直是柏拉图式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梅农看作是“世纪初最伟大的实在论哲学家”<sup>③</sup>;而后,芬德莱就读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梅农工作的地方),师从梅农学派的领袖马利(Ernst Mally),1933以《梅农的对象论》获得哲学博士<sup>④</sup>。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罗素、梅农之争后向英语哲学界全面介绍梅农对象论的著作,书中也强调了马利如何克服梅农困难的逻辑努力,开创了梅农“非存在对象”(nonexistent object)逻辑系统的构建。

梅农《对象论》的原意是解决布伦塔诺的意向的“内存在”(inexistence)问题,他提出了关于对象的“物项论”(theory of items)。一个“物项”既可以是实际存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存在的对象。“物项”的构造应该满足“不受限的自由假设原则”,而对物项的描述则满足“不受限的刻画设定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拥有“金山”,并且“金山”同时拥有“是金的”和“是一座山”的属性。

为了应对罗素指出的存在性难题,梅农认为,属性(property)应当被区分成构成性的(konstitutorische, constitutive)与非构成性的(ausserkonstitutorische, non-constitutive)。芬德莱以核心属性(the Nuclear Properties)与超核属性(the Extra-Nuclear Properties)取代。与物项直接关联的属性是核心属性,如“是红的”;而基于核心属性的属性(用弗雷格的话来说是“二阶谓词”)则属于超核属性,如“是存在的”“是未知的”等。只要不混淆两者的使用,存在性难题就可以避免。芬德莱理论为罗特里(Routley)、帕松斯(Parsons)和扎尔塔(Edward N. Zalta, 目前为“斯坦福哲学百科”主编)所发展(1970-80年代)。

作为哈佛大学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生,齐硕姆对现象学的兴趣却源于分析哲学家摩尔和罗素的到访。齐硕姆的认识论逻辑发展地形式化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并发展出内在主义的知识论。齐硕姆首先定义了三个基本的概念,即“有理由的(reasonable)”“可接受的(acceptable)”“明见的(evident)”,然后利用这一组概念构造了9个准则。稍后(1965年),齐硕姆开始结合摩尔的“绝对孤立法”方法研究布伦塔诺的“内在价值”概念,提出了定义“内在价值”的几组准则。之后,为消化批评者提出的反例,他又将意向性引入内在价值的分析,提出了称为“意向性孤立法”的分析现象学方法论原则,而与此相关的是他提出的“反义务命令式和道义逻辑”(1963年)<sup>⑤</sup>。

齐硕姆的理论通过他的高产和多位著名的学生而得到传播,他的传统虽然在知识论和价值论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对早期现象学之被分析哲学接受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他本人主要由于知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研究而获得学术声誉。

## 二、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研究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的第一人是前面提到的考夫曼,他是维也纳小组活跃的非正式成员(当时他是一家石油公司的经理),也是胡塞尔的信徒,并于1920年开始与其频繁交往。考夫曼1938年移民美国时虽已失去对现象学的兴趣而转向杜威的实用主义,但仍在1940年发表《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纪念胡塞尔。在该著中,他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逻辑经验主义误解了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和明证性概念,把它们当作伴随经验活动的感觉及其材料,而不是使得对象知觉成为可能的内容,从而错误地将胡塞尔当作柏拉图主义者;第二,逻辑经验主义者将感官经验看作是不可分析的,实际上就主张了一种他们所反对的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sup>⑥</sup>。考夫曼的工作直到21世纪初才被休伊默发现并加以介绍。

有规模的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弗莱斯达尔和默汉蒂的研究最为突出。

早在作为奥斯陆大学学生的时候,弗莱斯达尔就对现象学颇有兴趣。他于1960年代初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时,其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正是当时分析哲学的执牛耳者蒯因。事实上,弗莱斯达尔当时对现象学感兴趣的一个动因就是试图从现象

学出发建立一套可以与蒯因一样好或比其更好的逻辑系统<sup>⑩</sup>,而他之后也在哈佛任教并作为蒯因的助手,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蒯因学说的权威诠释者。

1958年,弗莱斯达尔在奥斯陆做了一个“胡塞尔与弗雷格”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62年,他以“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为题,作为在哈佛大学的各种当代哲学系列讲座中5讲中的第三讲——很显然,弗莱斯达尔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启发于蒯因,主要是因为蒯因关于命题态度或内涵逻辑之研究的激励。同时,他也完成了博士论文《指称模糊性与模态逻辑》的写作,该论文的最初意图恰恰是沿着现象学的路线发展出可以与蒯因媲美的逻辑系统(该书已于2004年被纳入已故的诺齐克所主持选择的一套有影响的哈佛哲学博士论文丛书正式出版);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作者在论文中始终没有提到胡塞尔,即使在论文末尾的书目和索引中也没有出现胡塞尔的名字<sup>⑪</sup>——当时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印度裔哲学家,默汉蒂的哲学兴趣是关注两个融合: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融合、印度哲学(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融合。1964年,默汉蒂出版《爱德蒙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sup>⑫</sup>,试图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胡塞尔的语言哲学、形式逻辑观念等;但是,这种最初的研究在当时被批评为不完整、不清晰<sup>⑬</sup>,除了在北美现象学的小圈子内,似乎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待见。

尽管如此,在今天,默汉蒂的著作与弗莱斯达尔1969年的论文《胡塞尔的意向象概念》一道,已经成为这种比较研究的经典。相比之下,弗莱斯达尔对“意向象”的条理分明的说明要完整得多,他从胡塞尔的文本出发列举了12个方面来阐明“意向象”(Noema)概念<sup>⑭</sup>。

弗莱斯达尔从胡塞尔文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出发,以系统论证(systematic arguments)的方式阐述了其观点。我们可以将12个命题根据内容的性质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意向象及其结构部分,论证了意向象如何作为广义化的意义及其所具有的结构成分和对对象的指向功能;二是意向象与意向行为部分,论证了意向象作为意向行为的内容而不是对象,以及意向行为与意向象的关系;三是意向象的获得部分,论证了意向象不是通过感官而是通过现象学反思获得。

弗莱斯达尔对胡塞尔的说明方案,在美国有时被称为“西岸”理解,地理上属于加利福尼亚州,具体就是斯坦福大学,以弗莱斯达尔为首,包括他的同道、以前的学生和追随者,如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麦金太尔(Ronald McIntyre)、史密斯(David Woodruff Smith)、扎尔塔(Edward Zalta)等。这个流派着力于胡塞尔早期思想与分析哲学的关联,主要从弗雷格的角度理解胡塞尔:“弗雷格注意到含义在语言指称中的作用,胡塞尔广义地看到意义在意向性中的作用。根据弗雷格,语言表达式指示指称,以其意义或含义的方式;根据胡塞尔,意识行为意向性地指向对象,以其意向象的方式。”<sup>⑮</sup>与此相反,集中于波士顿-华盛顿走廊的“东岸”解释注重胡塞尔后期哲学与逻辑学著作,它按照胡塞尔的思想来理解现象学<sup>⑯</sup>。

### 三、现象学立场之运用于分析哲学

心灵哲学至少有两个来源——日常语言学派和人工智能研究。第一个开始于赖尔1949年的《心的概念》,如前所述,这个开端与现象学的关系是紧密的。第二个开始于图林基于计算机概念的思维本质的分析,这个传统一度成为心灵哲学的主流。1950年代,关于心灵问题的哲学立场以唯物主义者占主流,他们寻求更为精致的、一般化的自然主义的心灵本体论:精神状态等同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状态(记号地或类型地)。

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心灵的计算模型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观点开始主导心灵哲学:心灵是脑的功能态,犹如计算机的软件之于其硬件。此时,现象学也开始提出一些问题来支持功能主义的范式。但是,反对这种论调的声音也开始响起,内格尔在1974年的著作《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中,将意向性看作独立于神经事件的过程,认为心灵具有自身的属性,它既不能由脑结构,也不能由脑功能的物理原因加以说明。

反对人工智能(AI)最坚强的声音首先来自德雷福斯。1965年,他还是MIT(计算机的重镇)的教师时,就撰写了《炼金术与人工智能》一文,攻击纽威尔(Allen Newell)和司马贺(Herbert Simon)的AI模型。他不仅反对他们所获得的结果,而且也反对他们声称智能乃是依据形式规则所作的物理符号处理的理论前提。为此,他还曾被邀请前往正在运行AI的兰德公司访问过一段时间。1972年,他将这种反对意见以一部书的厚度出版,名为《计算

机不能做什么》<sup>29</sup>。

德雷福斯首先梳理了AI理论的四个基本理论预设:生物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AI的生物学预设是,人的大脑类比于计算机的硬件,人的心灵类比于计算机的软件;而心理学预设则是,心灵活动乃是基于离散的表征或符号而以算法规则的形式运行的离散的计算。这种重要的心理学预设依赖于其认识论预设和本体论预设。认识论预设认为,所有的活动(不管生命客体还是非生命客体)都可以在数学上形式化为预测性的规则或法则;而后一个预设则声称,所有的实在都是由一套相互独立的不可再分的原子事实构成。因为实在是原子事实,它们就可以表征为离散的符号系统,从而人类的认知本质上是依据内在规则进行的内在符号处理,即计算。由此,处理内在心灵规则的方式与处理外在物理规则的方式是相同的,都是计算。所有上述预设也表现出AI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人类的心灵可以看作是独立于与境(context)的、独立于它的生理基础的,即心灵既可以在人体的生理结构中实现,也可以在计算机的电子元件中实现。

德雷福斯主要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传统(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视角)批评AI的理论预设。他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以理解物理客体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行为不可能通过“客观的”、与境独立的科学定律来预测。与境独立的心理学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自身在世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是高度与境关联的,任何试图以将我们分离出与境的方式来研究心灵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诚然,这并非否认AI原则上的可能性,假如AI能够依赖于一个类人的存在而产生,类人的智能就是可能的。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开始融合的时间并不确定,德雷福斯对AI的批评似乎可以看做这一标志,但是,其批评中的现象学意味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

对AI的批评还有待于另一位具有更深厚现象学传统的人来佐证,那就是塞尔。作为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发展了“言说行为”理论,在《意向性》一书中,他明确了自己的方案与布伦塔诺和梅农的批判性继承关系<sup>30</sup>,并扩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该书将语言哲学看作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以“意向表征”替换“语言表达”,以“意向内容”替换“命题内容”,将语言真理之“真值条件”的满足替换为意向满足的“真诚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通过区分意向性和内涵性来克服布伦塔诺的“意向内存在”

(intentional inexistence),从而排除梅农式的“非存在对象”:无法以对象满足的意向内容是内涵性的,如“圆方”“金山”等。

塞尔反对计算机具有意识的理论。在他看来,计算机只有语形学而没有语义学,计算机中的符号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大脑产生了意识属性和意向性,这就是生物学的全部,它们要求一个“第一人称”的本体论。塞尔的理论看起来极像是胡塞尔的现代版,然而,根本不同的是,塞尔将意向性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认为对意向性的了解依赖于自然科学,而胡塞尔却早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意识自然化的自然主义倾向,主张意向性先验于自然。虽然塞尔本人也曾抱怨人们将其研究归属于现象学立场,但他对意向性的重视以及他对其导师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现象学立场)的美国化多少影响了人们的看法。

可能是由于德雷福斯同样的理由,塞尔的《意向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对AI的反驳得到足够重视的是他的《心灵、大脑与程序》一文。虽然这篇论文并没有提到图林的观点和立场,但其论证结构与图林那篇划时代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思维》极其相似。事实上,它已经被认为是对图林所开创的功能主义心灵哲学的强有力的反驳。在这篇论文中,塞尔构造了那个著名的“中文屋”思想实验:一个能够正常操作中文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理解中文;同样,一台看上去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可能并不具有理解能力,从而也就没有真正的智能。但塞尔在该文中完全没有提到他的现象学立场。

诚然,塞尔本人是深受德雷福斯的影响的,不同的是,他采取了能够让分析哲学家更好理解的方式精致而巧妙地提出了问题,而且,塞尔似乎有意将德雷福斯的存在主义色彩转化为经验论者——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是经验论者——更好理解的自然主义色彩。他关于理解能力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的观点,似乎是梅诺-庞蒂关于存在(具身性)与意义(意识)相对化的自然主义翻版。因此,他也被认为发展了一种“现象学因果性”的观念。不同于德雷福斯的现象学意味主要来自梅诺-庞蒂和海德格尔,塞尔的现象学意味主要来自布伦塔诺和梅农,更注重对象问题,因而,心理主义(自然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

对关注心灵问题的早期分析哲学家来说,现象学主题最初在德雷福斯和塞尔那里只是一个副产

品,完全可以忽略;他们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立场。

然而,德雷福斯和塞尔的不懈努力正赶上 AI 自身的困境,心灵哲学家的注意力终于通过他们有限度地转向了现象学。今天,心灵的“具身性”问题已经成为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个热点。这时,心灵哲学家才发现德雷福斯原来也是一位真正的现象学家,他是英语哲学中对胡塞尔、海德格尔、梅诺-庞蒂和福柯著作的一流的诠释者,虽然他同时也融合了分析哲学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德雷福斯的思想也曾影响了红极一时的哲学异类罗蒂,从而使得后者关注大陆哲学和哲学风格的研究。

#### 四、三条路径交融

塞尔的研究激励了一批关注现象学自然化的人,一些具有分析哲学气质的现象学者也开始使用“自然化的现象学”理论来解决心灵与存在的难题,它代表着在不用将意识还原到物理事件的副现象(epi-phenomenon)上仍然坚持以科学方式研究意识的努力<sup>①</sup>。华莱士在《主体性的禁忌》中论证了自然化的现象学的可能性:自然化关涉对意识的科学研究,但不必基于科学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合法的自然化形式应该是詹姆斯的激进经验主义方式,即“将心灵……从其为神学动机和笛卡儿机械论哲学所分离的状态中,重新导入自然”<sup>②</sup>。无疑,这也是现象学对蒯因之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化思潮(实用主义的深化形式)的响应。

诚然,这种自然化的路径不会令胡塞尔的分析性追随者满意。默汉蒂认为,自然化概念具有先天的缺陷:“如果自然是一个因果秩序,那么,意向行动之为意向的,就不可能在其中具有位置;而如果一个意向性的因果说明是允许的,那么,正如它一定是在一个自然主义的理论之内一样,诸如此类的说明就应该是可以通过的。”默汉蒂也同意,因果性与意向性可以是相容的,但不是在同一水平上,而是在“话语的两个不同水平”上,即意向性是对因果性的超越,意向性先天于因果性<sup>③</sup>。

默汉蒂的哲学研究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哲学主流,但是他本人对哲学主流是敏感的。1970年代,他的现象学诠释就已经与心灵哲学联系起来了,这是他早期工作中所没有的。这时,他认为对意向象应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语义学的,一种是认知科学的。而欣迪卡1975年的著作《意向性的诸意向与其他模态的新模型》还只是坚持“意向象”的语义学理解,认为意向象是来自真值可能世界的函

项,其意义的函项在外延中给定<sup>④</sup>。

作为弗莱斯达尔的学生,史密斯和麦金太尔明确自己的工作就是分析现象学,他们著于1982年的著作《胡塞尔和意向性:一个关于心灵、意义和语言的研究》发展了弗莱斯达尔所开创的传统,通过模态逻辑分析自觉地将现象学与心灵的分析哲学结合起来。该书被史密斯自己称为“对分析现象学的一本书厚度的发展,涉及胡塞尔现象学的诠释,他的意向性理论,他的历史之根,以及逻辑理论、心灵与语言的分析哲学问题,并未设定先天的背景”<sup>⑤</sup>。

之后,默汉蒂自己也开始接受“分析现象学”这个术语,并且其著于1989年的著作《先验现象学:一个分析的研究》代表着比较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现象学”较为明确的形态。该书研究当代先验现象学文本中的意识与意义的结构,同时涉及分析哲学中的问题及其历史<sup>⑥</sup>。

德雷福斯1980年代对胡塞尔的研究也是三条路线融合中的一部分。在他主编的《胡塞尔、意向性和认知科学》(1982)一书中,他把胡塞尔看作是当代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先驱,其理由是:胡塞尔是第一位将心智表征的意识指向性作为其哲学中心的哲学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心智表征的一般理论。德雷福斯不仅将胡塞尔的这种发展区分为心灵的表征理论和心灵表征的计算理论两个部分,而且还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把胡塞尔意向象的语义学作用理解为指称、描述和综合三种功能<sup>⑦</sup>。如笔者所论,意向象实际上是一个簇化的摹状词<sup>⑧</sup>。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融合工作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形态:一种是以融合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为明确任务的形态,即目前意义上的所谓“分析现象学”形态;一种是以现象学立场解决心灵哲学中的具体问题的形态。可以说,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融合工作的新近进展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我们需要更大的篇幅和更艰辛的工作来介绍1980年代以后的工作。

#### 注释:

① M.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6. Cf: P. Hylton's Bookreview,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5: 556-563.

② J. N. Mohanty, *Husserl and Fre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6. Cf: D. W. Smith's bookreview,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95, No.1, 1986: 118-120.

③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早期互动与中期分裂,参见拙文《分析

- 现象学的过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 年 2 期，第 22-27 页。
- ④ H. W. Huemer, Logical Empiricism and Phenomenology: Felix Kauffmann, In *The Vienna Circle and Logical Empiricism: Re-evalu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F. Stadler, ed., New Jerse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3: 154-158.
- ⑤ D. W. Smith, Phenomenolog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henomenology/>, 2008.
- ⑥ 赖尔：《心的概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⑦ G. Ryle, Critical Note: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J]. *Mind*, 1929(38,151): 355-382.
- ⑧ 关于这种类似性，德雷福斯有个暗示，参见：Dreyfus, Hubert & Dreyfus, Stuart: 'From Socrates to Expert Systems', in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Oxford: Blackwell, 1986. 当代德性论者明确注意到了这个区分，参见 Annas, Julia: 'Virtue Ethics', in David Copp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8.
- ⑨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The William James Lectures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55", (ed. J. O. Urm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 ⑩ 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 ⑪ 章士嵘、王炳文（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心智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3 页。
- ⑫ G. Kü ng, A bookreview for Smith and McIntyre 1982, *Nous*, 1984 (5): 158-161. D W Smith and R McIntyr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a Study of Mind, Meaning, and Language. Dordrecht and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 ⑬ J.N. Findlay. *The Discipline of the Cave*, London: Allen & Unwin/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6: 31.
- ⑭ J.N. Findlay. *Meinong's Theory of Obje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2nd ed. Also see *Meinong's Theory of Objects and Values*, 1963.
- ⑮ R. Feldman, 'Roderick Chishol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hisholm/>, 2008.
- ⑯ H. W. Huemer. *Logical Empiricism and Phenomenology*: Felix Kauffmann. // F. Stadler (ed.). *The Vienna Circle and Logical Empiricism: Re-evalu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New Jerse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3: 152.
- ⑰ 弗莱斯达尔：《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哲学译丛》1998 年第 2 期。
- ⑱ Dagfin Føllesdal. *Referential Opacity and Modal Logic*. Routledge, 2004.
- ⑲ J. N. Mohanty. *Husserl and Fre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
- ⑳ D. W. Smith. Bookreview,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86 (95, 1): 118-120.
- ㉑ D. Føllesdal. Husserl's Notion of Noema.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9(66, 20): 680-687.
- ㉒ Smith, D. W. & R. McIntyre, *Intentionality via Inten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1(68, 18): 541-561
- ㉓ 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张建华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8-219 页。
- ㉔ H. Dreyfus, *What Computer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Haper & Row Publisher, 1972.
- ㉕ 塞尔：《意向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6 页。
- ㉖ J. Petitot et al (eds),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㉗ B. A. Wallace, *The Taboo of Subjectivity: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8.
- ㉘ J. N. Monhanty, *Intentionality and Noema*,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1, 78(11): 706-717.
- ㉙ J. Hintikka, *The intentions of Intentionality and Other New Models for Modalities*. Boston: Reidel, 1975.
- ㉚ D. Smith, *Phenomenology*,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 2003.
- ㉛ J. N. Mohanty,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Analytic Account*.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 1989.
- ㉜ H Dreyfus and H Hall (eds.), *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2: 193-194.
- ㉝ 颜青山：《意向对象与摹状词》，《哲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 杨捷]

## Three Paths to Reconciliatio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YAN Qingsh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Wester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used to be characterized as two opposite movements, i.e. the one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the Britain and USA and the other of phenomenology in European Continent. But they have started to be reconciled many years before and formed a scholar community named "Analytical Phenomenology". From a historical view of philosophy, there are three paths to such reconciliation. The first is analysis of phenomenology, including the Oxford school and the studies in USA from Findlay to Chisholm and to Foellessdal; The second i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he two movements, such as Foellessdal's early work introducing phenomenology into analytical philosophers and Mohanty's comparison between Frege and Husserl; The third is the application of phenomenology i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mind and its early influential works are agains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led by Dreyfus and Searle.

**Key words:** analytical 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reconciliation; three paths